

近20年丰子恺研究述评(1997—2016)

宋睿 潘建伟

(杭州师范大学 艺术教育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1997年至2016年的丰子恺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大大超越了之前任何一个时期,及时对之进行总结便显得非常必要。现从“美术研究”“文学研究”“艺术思想研究”“生平与作品考证及其他”以及“港台及国外的研究”五个方面分别进行评述,通过回顾近20年的丰子恺研究,展示所取得的成绩与突破,发现所面临的问题与不足,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丰子恺研究;述评;逐渐成熟期

中图分类号: K825.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12(2017)03-0079-16

大致来说,近百年的丰子恺研究可以分为4个阶段。从郑振铎、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等在1925年为《子恺漫画》作序跋文起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丰子恺研究可概括为“摸索前期”,相关的文章大多为印象式的,但却形成了一些经典性的意见,比如俞平伯说的“画格旁通于诗格”(《〈子恺漫画〉跋》)、郁达夫说的“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在他的画笔之上”(《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朱光潜说的“在人品和画品两方面都受到弘一的熏陶”(《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为嘉定丰子恺画展作》)以及吉川幸次郎说的“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以及他的气品、气骨”(《缘缘堂随笔·译者的话》)等等。这些意见在此后的研究中被不断地深化,可见丰子恺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较高的起点。

从1949年至197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个阶段的丰子恺研究为“遭遇挫折期”,尤其到了“文革”,丰子恺本人成了批斗对象,故而此期间中国大陆基本谈不上研究。不过,在港台及海外有一些较有价值的评论,如马骏的《读丰子恺漫画〈护生画集〉四集》(载1963年1月2日新加

坡《民报》新年特刊)、李辉英的《丰子恺和丰子恺的漫画》(载1972年4月2日香港《亚洲周刊》)等。这些文章是这一时期难得的亮点。

从1976年至1997年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丰子恺研究进入“稳步发展期”,大致说来,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回忆、介绍为主,研究性的文章较少。从1983年陈星发表《丰子恺散文艺术的特色》(载《杭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殷琦发表《丰子恺散文研究初探》(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4期)等起,才逐渐出现系统的学理性论文。相关的年谱、传记及作品考订、资料汇编工作也在稳步进行,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另外,在这一阶段,上海、桐乡的丰子恺研究会分别于1984年、1992年成立,并推出内刊《杨柳》。

从1997年以来至今为第四阶段,是丰子恺研究的“逐渐成熟期”。1997年10月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简称“弘丰中心”)的成立,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1998年10月28日,弘丰中心举行了纪念丰子恺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随后,出版了由朱晓江主编的论文集《丰子恺论》(西泠印社2000年初版)。从2005年起至2016年,弘丰中心主办了三次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了三本会

收稿日期:2017-03-22

作者简介:宋睿(1993—),女,山东青岛人,杭州艺术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唯美主义艺术思想研究;潘建伟(1980—),男,浙江绍兴人,博士,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诗学及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

议论文集。2016年10月,由陈星任总主编的《丰子恺全集》(全50卷)由海豚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丰子恺作品编纂最全面、细密的成果,也是近20年来丰子恺研究的浓重收笔。概括来说,此阶段的丰子恺研究有如下三大特点。

其一,研究队伍迅速壮大。陈星曾在《丰子恺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收入朱晓江主编的《丰子恺论》)一文中说过“就目前的情形而言,从事丰子恺研究的学者相对于弘一大师研究的学者,在人数上还不够多,研究的领域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拓。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丰子恺研究一定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第28、29页)这一看法颇具前瞻性。以近20年中国大陆的硕博论文为例,以弘一大师(或弘一法师、弘一、李叔同)为题目的硕博论文仅24篇,其中博士论文3篇;而以丰子恺为题的硕博学位论文却多达93篇,其中博士论文5篇。^①张斌的《丰子恺绘画中的诗意》(中央美术学院2005年)是中国大陆第一篇丰子恺研究的博士论文,并经修订后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在2007年正式出版,书名为《丰子恺诗画》。她的另一部著作《绘画与诗意——丰子恺的艺术》(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初版)是对丰子恺绘画中“诗意”的进一步探究。张斌之后,相继以丰子恺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的有王文新的《丰子恺美术教育思想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8年)、陈剑的《丰子恺艺术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山东大学2011年)、黄思源的《丰子恺文学创作与绘画》(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以及冉祥华的《丰子恺美学与艺术思想的佛学意蕴研究》(山东大学2015年)。关于“近20年丰子恺研究的硕博学位论文选题分析”甚至可以单独成文。

其二,研究主题愈加专门。1995年,陈星出版了《清凉世界——丰子恺艺术研究》,对丰子恺的绘画、文学与音乐之艺术成就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丰子恺研究专著,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但到最近几年就很难看见这种全方位研究的著作了。随着研究专门化进程的深入,论者们都倾向于将丰子恺的某一领域的成就加以探讨。如陈星于2004年出版《丰子恺漫画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初版),该书是一部较为完整的丰子恺漫画研究专著,从论述丰子恺漫画的肇始起,对丰氏漫画的艺术特

色、题材分类、艺术理论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另外,之前对于丰氏艺术成就多着眼于其题材、风格、形式等方面,而结合其艺术理论研究过少,近20年以来在这一方面则大有突破。

其三,研究方法逐步更新。前三个阶段很少涉及的城市学、社会史、图像学、互文性理论、文化人类学等方法被运用于丰子恺的文艺研究,如王文新的《丰子恺插图艺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初版)运用互文性理论,以丰子恺为叶圣陶著的《古代英雄的石像》、俞平伯著的《忆》、叶圣陶编写的《开明国文课本》、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周作人著的《儿童杂事诗》、鲁迅著的《阿Q正传》而创作的插图为研究个案,讨论了文本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并以“德性之光”总结了丰子恺插图漫画的审美品格。再如陈伟、刘飞飞的《空间艺术中的时间叙事杰作——论丰子恺漫画的时间叙事性》(载《东方丛刊》2009年第3期)借鉴叙事学理论,分析了丰子恺漫画的空间叙事特点,选题具有创新性。当然,在运用新方法来解读丰子恺漫画时较难避免产生“强制阐释”的问题。如何从新的视角切入丰子恺研究,同时又不曲解、误解研究对象,或许是今后该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

本文通过回顾与总结1997年至2016年的丰子恺研究,展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与突破,发现所面临的问题与不足,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必须提及的是,对于丰子恺的研究综述早有学者努力为之。陈星在1995年出版的《清凉世界——丰子恺艺术研究》第五章“学林探路:丰子恺研究回顾与评析”中就已简述了从1925年到1995年七十年来丰子恺研究的状况。该文后略作增补,收入朱晓江主编的《丰子恺论》。陈星另在《丰子恺评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初版)的附录《近三十余年丰子恺研究与纪念活动综述》中对1978年至2011年的丰子恺研究进行一次整理,该文偏重介绍著作,较少评述论文。朱晓江的《丰子恺散文研究述评》(收入杭州师范大学弘丰中心编的《第三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初

^①此为不完全统计,在笔者写作本文时,“中国知网”尚未收录完整2016年的硕博学位论文。另外,历年没有上传到知网的学位论文也未统计进去。

版) 梳理并评价了从 1930 年以来关于丰子恺散文的研究成果,对于 90 年代以来研究者的撰述尤为详尽。黄仪冠的《丰子恺与台湾之因缘》(收入杭州师范大学弘丰中心编的《第三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五部分为“台湾研究成果概述”,主要介绍了台湾近 20 年来丰子恺的硕博学位论文概况。限于篇幅,笔者详人之所略而略人之所详,拟从“美术研究”“文学研究”“艺术思想研究”“生平与作品考证及其他”分别予以介绍,加上单列一项的“港台及国外的研究”,故而全文共为五大部分。

一、美术研究

丰子恺的美术成就涉及漫画、书法、装帧、木刻等多个方面,而漫画无可置疑的是其美术成就的主要方面。发展到 21 世纪的丰子恺漫画研究,不管是从广度还是深度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从艺术思想的层面探讨丰子恺的漫画艺术;二是将新方法、新理论运用于丰子恺漫画的研究。

先说第一个方面。以往对丰氏漫画的研究,往往着重于对其漫画进行风格梳理、类型界定,或对单幅多幅漫画进行具体分析与鉴赏,在这 20 年中此类研究已经大量减少(当然也有一些,下面会介绍),而着重从艺术思想的层面,深入研究丰子恺漫画艺术的整体价值。朱琦的《曲高和众 雅俗共赏——论丰子恺的艺术观及其漫画特征》(载《文艺研究》1998 年第 4 期)认为丰子恺独特的艺术成就根植于他的艺术大众化思想,并引叶圣陶评丰氏画“出人意外,入人意中”一句解释道“出人意外,是指所画的大多是别人没有画过的,故而有新鲜感;入人意中,是指这些题材几乎又都来自现实生活,是大家熟悉或曾经感受的,因而使人感到亲切。”成立的《丰子恺的艺术理论与漫画创作》(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 年第 4 期)认为只有揭示出“他的理论探讨和漫画创作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才能“真正认识丰子恺在现代中国画革新运动中的杰出贡献”。蒋霞、杨晓河的《丰子恺的中西绘画比较论及其当代意义》(载《艺术百家》2011 年第 7 期)认为丰氏避免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平等的原则下建构符合中国美术特色的话语

体系。查律的《丰子恺漫画基本思想评述》(收入陈星主编的《丰子恺艺术与艺术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初版)从“印象鲜明”“画中有诗”及“线的雄辩”概括了丰子恺漫画的基本思想,由此认识与理解丰子恺漫画的形态及内理。李兆忠的《东方诗魂的共鸣——丰子恺与竹久梦二》(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 年第 11 期)认为留学日本的十个月时间在丰子恺的艺术思想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与竹久梦二的相遇使得陷于西洋画困境中的丰子恺找到了创作方向,成功地完成了绘画道路的转型。黄江平的《论丰子恺民俗审美的特征及其当代价值》(收入杭州师范大学弘丰中心编的《第三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概括了丰子恺民俗审美的特点是乡土情结、人生情味与现实情怀,同时又指出其在认同价值、教育价值与和谐价值上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陈星的《丰子恺佛教题材绘画的平民化意识》(载《美育学刊》2015 年第 5 期)一文着重讨论了丰子恺的“护生画”“警世漫画”和“绘佛千尊”等绘画作品中所体现的平民化意识,认为这些作品都共同构成了丰子恺佛教题材绘画创作的内容。作者又于 2006 年出版专著《丰子恺佛教题材绘画作品的平民化意识与警世价值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2016 年初版),从丰子恺佛教题材绘画的作品种类及创作过程到创作因缘及时代佛教背景,再到作品的价值与意义,都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潘建伟的《论丰子恺对陶渊明的接受》(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 年第 12 期)从日常生活、漫画主题、文化思想与艺术精神四个层面,参照鲁迅与朱光潜关于陶渊明的艺术风格之争,论述了丰子恺对陶渊明接受的独特意义。作者指出“鲁朱之争在丰子恺那里很自然地会被消解,他一并转化了陶渊明勤笃躬耕、坚贞守节的现实担当与泯化喜惧、任天委运之生命境界,这使他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战乱与政治运动中保持着艺术的独立与人格的自由。”

第二是新方法、新理论的运用。近 20 年来,学者们将新方法、新理论运用于漫画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了丰子恺漫画的意义。小田(朱小田)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了丰子恺的作品,连续发表了数篇有较高价值的论文。他的《漫画: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社会史素材——以丰子恺漫画为对象的分析》(载《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将

丰子恺的漫画作为社会史研究对象进行分析,通过艺术与历史的跨学科对话,使漫画以独特的方式拥有了社会史意义。作者指出“漫画以其独特的艺术话语,展现了一个时代日常角色在社群网络中的互动和流动场景,并让历史角色发出自己的声音,揭示了蕴含于底层——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史意义,贡献了漫画作者自己的观念。”作者另有《论“社会时间”——依托于丰子恺笔下的村妇考察》(载《河北学刊》2007年第2期)、《丰子恺作品的社会史考察》(载《民族艺术》2009年第1期)与《儿童生活之往昔:丰子恺作品之社会史考察》(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等论文也从这一视角考察立论。

陈占彪的《叶浅予、丰子恺、张乐平漫画中的上海社会》(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丰子恺漫画所体现的“乡野与都市”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陈伟的《都市表情的真实写照——从都市文化的角度看丰子恺漫画》(载《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立足于艺术创作与都市文化的关系,探究了丰氏漫画形成的现实基础与历史渊源,并进一步思考了这一现象的文化价值及其当代意义。王先霏的《丰子恺〈护生画集〉对现代生态文艺学的启示》(载《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从生态文艺学的角度考察了丰子恺“向心灵呼吁”的“护生”对于现代生态文艺学的重要启示。作者认为丰子恺“护生即是护心”的说法,从人与自然归于一心的角度探讨生态问题,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间徘徊不定的困局”。龙瑜晟的《丰子恺与“漫画”概念》(载《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在跨文化研究的视阈下,分析了丰子恺漫画由“正宗”到“异类”的过程。该文认为,丰子恺充分发挥了主体性精神,“在当时过分逼仄的接受语境中,灵活挪用西方资源,为中国文化争取必要的生存空间,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策略”。郑素华的《作为“异世界”的儿童:丰子恺的童年民族志书写》(载《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年第5期)运用文化人类学关于民族志的理论来解读丰子恺的“儿童相”。该文从“儿童活动的行为与心理层面的‘深描’”“童年‘生活相’的广泛呈现”以及“童年民族志的社会批判”三个层面认为丰子恺“既融合了卢梭式的自然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儿童观,又兼有‘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

学’的书写特质,建立了一种具有现实主义取向的童年民族志描述之典型”。唐卫萍的《“印象派”与“诗”:论丰子恺的绘画思想》(收入杭州师范大学弘丰中心编的《第三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认为丰子恺的绘画创作及理论打破了文与画的藩篱,从以“印象派”为代表的西洋画之视角重新诠释了中国古典诗。作者最后指出“通过‘诗’这一通道,他重新阐释了中国的绘画传统,而通过‘印象派’,他又抓住了世界艺术发展的潮流。而他本人的绘画创作也在东西方绘画目光的交错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外,在漫画研究领域还需要提到的是关于丰子恺画史地位的重新认定、漫画作品的分析与鉴赏等。毕克官、黄远林早在1986年写的《中国漫画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初版)第四章第三节中就认为丰子恺“不仅以《子恺漫画》统一了中国的漫画名称,也是抒情漫画这一画派的开创者”(第76页)。新世纪以来的研究对丰子恺的画史地位都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且大都认为其漫画类型属于“抒情漫画”。如甘险峰的《中国漫画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初版)第三章第三节的标题就是“抒情漫画大师丰子恺”,并认为“在中国漫画发展史上,应当说丰子恺是影响最大的漫画家之一。他虽然在漫画舞台上出场稍晚,但他一出现就凭着自己扎实的文学功底和独到的艺术灵感异军突起,一跃成为漫画界巨擘,赢得了同时代人及后人的称赞。”(第82页)余连祥的《丰子恺:中国“感想漫画”的开拓者》(载《艺术百家》2006年第2期)也持类似的意见,该文就丰子恺与中国漫画史的问题展开讨论,认为虽然早在1904年现代意义上的“漫画”就已出现,但统一中国的漫画名称的还是“子恺漫画”。但作者对于“抒情漫画”的类型归属表达了不同看法,他在借鉴丰子恺关于感想漫画、讽刺漫画、宣传漫画的三种分类法的基础上,指出丰子恺最具特色的漫画称之为“感想漫画”比“抒情漫画”更恰当。萧平的《丰子恺先生的画史位置》(载江苏省美学学会编的《城市文化与艺术审美》2008年10月)一文指出,丰子恺开创了一种“中国文人画的新模式”,其中有着“高雅悲悯的心迹”“人性和禅机”以及“文学与哲学的情和趣”。赵威的《画中有话,艺中有意——从〈太平洋报〉探析陈师曾与丰子恺漫画之间的传承关系》(载《美与时代》

2015年第8期)以《太平洋报》中陈师曾的漫画为研究依据,从构图和笔触、留白和边框、题材与人物、诗意和标题等方面探讨了陈氏对丰子恺的多重影响,梳理出了“子恺漫画”的师承脉络。

在漫画作品的分析与鉴赏方面写得较好的论文有徐型的《丰子恺漫画的文学意蕴》(载《南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该文分析了抒情性、写实性和画题在丰子恺漫画中的重要作用。王峰的《“子恺漫画”之“漫”——论丰子恺漫画与文学创作的精神关联》(载《时代文学》2012年第4期)通过对丰子恺文学态度和文学主张的研究,体会其漫画语言的独特内涵与精神追求,总结了丰子恺漫画所体现的文学性有如下特点:写真现实,情意深广;文图呼应,古调新韵;绵里藏针,金刚怒目;冲淡简远,尽得风流。朱显因的《朱实相辉玉椀红——丰子恺的韩偓诗意画》(收入杭州师范大学弘丰中心编的《第三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讨论了丰子恺为高文显《韩偓》一书所作诗意画的创作缘起与艺术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画文相映的鉴赏性著述。较早采用这种形式的是明川(卢玮銮)的《丰子恺漫画选绎》(香港三联书店1976年初版),近20年来这种著述形式也广为学者们热衷。葛兆光的《丰子恺护生画集选》(中华书局1999年初版)从《护生画集》中选择了100幅画,配上简短的评语。葛氏在后记中称“我钦敬这些怀着慈悲胸怀和平静心情面对世界的人,看着世间种种残酷、暴虐、无情和奸诈,就有这样的人,会默默地用另一种人生来显示着世间的善良、和睦和坦诚,无论他们成功与否,他们使我们看到了世界还有希望。”(第233页)类似的著作还有陈星与朱晓江编著的《几人相忆在江楼——丰子恺的抒情漫画》(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初版)、苏学文的《丰子恺漫画品读》(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初版)、陈星的《都会之春——丰子恺的诗意漫画》(三联书店2003年初版)、丁秀娟的《丰子恺护生画新传》(东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初版)等,都是一画一文的方式编写。丰陈宝、丰一吟的《爸爸的画》共四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其中第一、二集于1999年出版,第三、四集于2001年出版。由丰子恺女儿们叙述绘画背后的故事,自然更值得重视。

最后谈一下关于装帧、木刻与书法的研究。

毕克官早在1982年的《美术史论》第2期发表的《朱光潜谈画——关于〈子恺漫画〉的两次谈话》一文中就提到过丰子恺的木刻艺术。作者在1993年的《美术史论》第4期又发表了《现代木刻版画的先行者——李叔同和丰子恺》,着重讨论了李叔同与丰子恺在中国现代木刻版画领域的贡献。他的另一篇论文《关于拓展丰子恺研究领域的思考》(收入《论丰子恺:2005年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初版)从封面装帧、书刊版面装帧、书文插图和木刻漫画四个方面谈到拓宽丰子恺研究的重要性。在毕克官的研究和提倡下,这些领域都产生了一些成果。陈星的《关于丰子恺的木刻漫画》(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针对丰氏木刻漫画的定位问题提出两种考察角度:其一,如果将此类画孤立起来看,可以视之为木刻,并可将丰氏视为中国现代木刻较早的实践者;其二,将“木刻”只是当作漫画的一种表现形式。该文同时认为,从第二种角度的考察,“符合丰子恺本人的实际”。在装帧的领域要比木刻讨论得更为广泛,吴浩然编选的《丰子恺装帧艺术选》(齐鲁书社2010年初版)择录了丰子恺各个时期为各类书籍、报纸、杂志设计的封面、扉页、插图、刊头画等共52幅,并在前言《独领风骚的丰子恺装帧艺术》中高度评价了丰子恺装帧艺术的特点。王双、李昌菊的《解析丰子恺书籍装帧艺术中的日本趣味》(载《美术向导》2012年第3期)探究了竹久梦二、比亚兹莱、落谷虹儿等外国艺术家对丰子恺书籍装帧艺术的影响,分析了丰氏装饰趣味的形成原因。吴东辰的《丰子恺与图书装帧》(载《图书馆建设》2001年第5期)认为丰子恺的装帧设计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风格原因在于如下四点:一是简单而生动的漫画特征;二是诗的意境;三是熟练的书法篆刻功底;四是音乐制作手法的借鉴,这四者使得丰氏的图书装帧自然淡雅而独树一帜。牟健的《坚守与探索——丰子恺书籍装帧艺术风格》(载《台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8期)认为丰子恺的书籍装帧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尤其体现出“仁”“诗意”与“童真”的特点。但总体上说,关于丰子恺装帧艺术的论文多着眼于介绍性的内容,或对其书籍装帧的特点进行泛泛的梳理,而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在书法研究领域也有一些成果。谢凌云的

《民国时期广西书法教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列举了徐悲鸿、丰子恺、马万里等八位代表书法家,其中评价丰氏的书法艺术极为精要,可惜由于主题的关系,所评只是点到即止,没有展开论述。丰子恺留下的书法作品并不少,并在《艺术修养基础》第十一章中专门讨论过书法,但对于丰子恺书法的研究却极为贫困。在这些少数的论文中写得较好的一篇是崔树强的《蕴藉有味 风神潇洒——读丰子恺先生的书法》(载《书法》2013年第3期),该文分别从丰子恺书法的特点、书艺的师承、书法的观念以及书法史的认识逐一进行评论,文笔优美,逻辑清晰。正如作者所说的,“丰子恺的书法所受到的关注较少,他的书名多被漫画的盛名所掩。实际上,丰子恺的书法是很有特色的,别具一格,可謂是风神潇洒,蕴藉有味”我们期待今后有更深入丰子恺书法研究论文出现。

二、文学研究

丰子恺的文学成就主要是散文,另有4部童话(其中1部为《儿童文学集外文》)、1部短篇小说《六千元》与175首诗词。朱晓江的《丰子恺散文研究述评》一文(以下简称“朱文”)对于丰子恺的散文研究成果的介绍颇为详备,该文分为“关于丰子恺散文中的佛教思想”“关于丰子恺散文的艺术风格”“关于丰子恺散文的史料整理”“关于《缘缘堂续笔》的研究”以及“丰子恺散文研究中的其他问题”五个部分。“其他问题”中包括了丰子恺儿童题材的散文,丰子恺散文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丰子恺与周作人、朱自清、夏目漱石等中日现代作家的关系以及丰子恺散文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等议题,大致涉及了丰子恺散文研究中的各个方面。在此笔者只对朱文疏于介绍的部分内容做一些补充。

其一,关于《缘缘堂续笔》的研究。朱文认为“《缘缘堂续笔》之所以能在丰子恺众多的散文中成为一大研究热点,除了它本身的艺术特色及写作过程中的传奇色彩,原因还在于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中‘潜在写作’的发掘。”这一评价基本符合文学史事实,尤其是在陈思和发表《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以及

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初版)以后,这部随笔集受到广泛的重视。陈著当代文学史为《缘缘堂续笔》专辟一节(第九章第二节“老作家的秘密写作《缘缘堂续笔》”),并对丰子恺在“文革”期间所体现的“达观与知命”之境界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改变了之前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对丰子恺于新中国成立后散文一笔带过的做法。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在陈思和以前,早已有人专门探讨过《缘缘堂随笔》。韦俊识的《散文天幕的一颗亮星——读丰子恺〈缘缘堂续笔〉随想》(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以“随想”的笔调高度评价了《缘缘堂续笔》的艺术精神,陈星的《清凉世界——丰子恺艺术研究》第三章第一节“散文小品”也用了一定的篇幅讨论《缘缘堂续笔》。近20年来最早发表相关论文的是徐型的《论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载《佳木斯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该文认为正是由于丰子恺对往事的回忆、对传统的依恋,才使他“暂时脱离尘世”。随着中国当代文学界关于“潜在写作”主题的深入讨论,《缘缘堂续笔》受到高度关注。景秀明的《建国初浙江散文:在坎坷中行进》(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认为《缘缘堂续笔》“代表了丰子恺在解放后散文创作的最高水平”。章龙福的《自然和易 真淳隽永——丰子恺散文风格简论》(载《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认为《缘缘堂续笔》是丰子恺“生命最终凝成的心血”。黄发有的《月黑灯弥皎 风狂草自香——当代视野中的丰子恺》(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3期)一文将丰子恺定义为当代文学中的“失踪者”,认为《缘缘堂续笔》是丰氏“浅醉闲眠”的方式,赞扬了丰子恺在艰难历史时期通过顽强的坚守保持着自己人格的独立与人性的关怀。

需要提及的是周仲强的《艺术审美的嬗变表征——读丰子恺〈缘缘堂续笔〉》(载《小说评论》2010年第2期),该文认为《续笔》中有多篇文章揭示社会的黑暗,解剖人性的丑陋,“昭示丰子恺‘护生’的意识结束,‘杀生’意识彰显”,并谈到晚年的丰子恺“价值取向已偏向于向人表述人性的丑恶,已失去缘缘堂时期淳朴、自然、平和的艺术审美情趣”。这一判断显然与陈思和等的理解大为不同,不妨亦聊备一说。

其二,关于儿童题材散文及儿童文学的研究。朱文提到但无暇述及这一主题,笔者在此做一些简述。在80年代就已有论者专门探讨过丰子恺的这一成就,如周小波的《丰子恺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载《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陈星的《谈丰子恺与儿童文学》(载《杭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等。最近20年来,随着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加上浙江师范大学儿童研究院的推动,丰子恺关于儿童题材的散文及儿童文学创作更成为论者们讨论的重点,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探讨丰子恺与儿童文学的关系。陈星的《谈丰子恺与儿童文学》一文已经明确提出“丰子恺早年散文中有一些赞美儿童、热爱儿童的主题并不能说这些散文就是儿童文学。”徐型的《丰子恺的儿童文学创作》(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继续陈星的说法,认为儿童文学是不仅要用儿童的口吻书写、所写为儿童之事,同时也需专门为儿童而写的作品。该文接着对丰子恺的《少年美术故事》《音乐故事》与《博士见鬼》三本儿童文学作品,从内容、特点、意义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这些作品具有紧贴儿童生活,力求做到知识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知识化,符合儿童的年龄、智力、兴趣等实际情况的特点,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有重要地位。”杨宁的《童心信仰与理想国的构筑——论丰子恺的童心信仰及其童话创作》(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认为丰子恺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意义:“他竭力表现的不是他作为成人对儿童的某种俯就或训诫,而是他对童心世界的虔诚以及对构筑理想国的渴望。”刘建峰的《“儿童教训”与“儿童崇拜”——叶圣陶与丰子恺的儿童观比较及其文艺创作》(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与王炳中的《冰心与丰子恺儿童题材散文的差异性》(载《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也持类似观点。前文认为叶圣陶从成人立场考察儿童,在创作上表现为“儿童教训”;丰子恺则从童年视角体悟童心,在创作上表现为“儿童崇拜”。后文认为冰心是“五四”后第一个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她从“大姐姐”的角度进行创作,而丰子恺是第一个站在“儿童崇拜”立场创作儿童题材散文的作家,两者在写作立场、叙事重点、抒情方式都有显著的差异。第二是结合佛学思想与儿童美育观探讨丰子恺儿童题材

的散文创作。王宜青的《丰子恺儿童观探微》(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依据丰子恺的散文、漫画与艺术理论,从儒道“童心说”的传承、佛家“护生观”的演变以及丰氏本人审美趣味的特征,剖析其儿童观的多层含义。王泉根、王蕾的《佛心·童心·诗心——丰子恺现代散文新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4期)认为佛心、童心、诗心构成了丰子恺艺术追求上的统一。李松的《童心与佛理契合的世界》(载《广西师院学报》2001年第3期)移用冯友兰的《人生的境界》中的术语而作了新的解释:“质朴无华的童心是丰子恺追求的自然境界,仁爱超脱的佛理则是他景仰的天地境界。丰子恺的审美理想就表现为童心与佛理的契合。”王黎君的《佛光隐隐蕴童心——试论丰子恺儿童题材创作的艺术特色》(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在佛性与童心的牵引下,丰子恺的散文与漫画在题材选择、审美观、审美风格以及创作手法上都表现出了独特的价值取向与艺术追求。

其三,关于诗歌的研究。朱文的主题是散文研究,诗歌研究也就付之阙如,在这里笔者略作陈述。诗在丰子恺的创作生涯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丰华瞻在《丰子恺与诗词》《父亲丰子恺对诗词的爱好》等文章中就一再强调诗与丰子恺其他文艺创作之间的重要联系。在近20年中,对于丰子恺漫画中的诗意探讨已非常详尽,而对丰子恺的诗词创作及其诗学思想的研究则颇为寂寥,只有少数几篇论文。向诤、涂小马的《丰子恺旧体诗词创作探论》(载《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梳理了丰子恺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并认为抗战流离的8年与60年代是其创作的高峰。黄济华的《画家丰子恺,本色乃诗人——论丰子恺与诗》(收入《论丰子恺:2005年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指出了丰子恺关于诗的四个意见:诗品与人品统一;诗应该具有平凡而伟大的艺术品格;诗贵自然,宜少用古典;诗应讲究格律。作为丰子恺的学生,潘文彦的《读丰师遗札》(收入《论丰子恺:2005年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重读了丰子恺写给作者的三封谈诗词的书信,回忆了两人之间的诗词往来。陈星早在1996年就曾讲丰子恺的诗词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并说“这也是丰子恺研究领域中很可有作为的一块处女地。”(见所著《清凉

三、艺术思想研究

丰子恺不但是位杰出的画家、散文家,而且在艺术思想上成就卓著。他是中国现代少有的一边进行大量创作、一边又进行理论探索的艺术家。但90年代以前,对于丰子恺的艺术思想探讨得很少,近20年以来相关的研究才逐渐增多。下面笔者从丰子恺的艺术思想及其渊源的探讨与艺术教育(美育)思想的研究两个方面进行介绍。

其一是关于艺术思想及其渊源的探讨。朱晓江从世纪之初就开始关注丰子恺的艺术观与科学观问题,他的《对主体性失落的警惕——丰子恺的艺术观与科学观》(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详细辨析了丰子恺关于科学与艺术的讨论,认为在西方科学理性的思想进入中国并渐成强势之时,丰氏强调艺术有别于科学的独立价值,事实正是在维护人作为主体的独立和自由。他的《有意味的遗忘:对科学思维的拒斥——丰子恺“中国美术优胜论”解析》(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探究,并认为丰子恺“刻意‘遗忘’了印象派以后西洋美术的科学主义特性,而竭力张扬了它的‘表现主义’倾向。”他的另一篇论文《传统的回归:从西洋美术转向“漫画”——1922年前后丰子恺艺术思想的转折及其思想史背景》(载《美术研究》2006年第3期)结合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背景与丰子恺日本留学的经历,深入分析了1922年前后丰氏由西方美术转向中国艺术传统的前因后果。作者还有《丰子恺“绝缘说”解读》(收入《论丰子恺:2005年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与《丰子恺“同情说”解读》(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二文认为丰氏艺术思想大体以抗战为界,从1937年前以道家思想为底蕴的“绝缘说”转向1937年后以儒家艺术思想为基础的“同情说”。朱晓江另有专著《一道消逝的风景——丰子恺艺术思想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01年初版)与《有情世界——丰子恺艺术思想解读》(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初版)二书,陈星的《近三十余年丰子恺研究与纪念活动综述》有介绍,不再赘述。

王黎君的《从佛境眺望人生——许地山丰子恺创作审美特征比较》(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将丰子恺与同样深受佛教思想浸染的作家许地山相对照,阐述了两者的理解方式。金妮娅通过《亦僧亦俗话人生——试论儒佛融通的人生观对丰子恺文艺创作的影响》(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走在梦与真的边缘——试论丰子恺儒佛互融的生命感悟及其文艺创作》(载《台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及《绝缘而有情——曲高而和众——试论丰子恺儒佛融通文艺观之特质》(载《山东文学》2006年第9期)三篇文章论述了丰子恺思想上体现的儒佛兼备的文化特性,指出这一特性使丰氏时时矛盾而又高度统一。余连祥的《丰子恺的审美世界》(学林出版社2005年初版)围绕丰子恺的“审美世界”展开论述,依次探讨了丰子恺的“美学思想”与“审美教育”、“缘缘堂随笔”的“审美价值”、子恺漫画的“审美情趣”以及其他艺术领域的“审美实践”等,最后分析形成其“审美个性”的成因。蒋霞、杨晓河的《丰子恺“三层楼”人生境界的审美蕴涵及当代价值》(载《艺术百家》2012年第1期)认为在丰子恺关于现实、艺术与宗教的“三层楼”譬喻中,现实层既是基础,又是旨归;艺术层兼备枢纽与本体的双重身份;宗教层则是最高境界。该文分别讨论了艺术与现实、艺术与宗教的关系,认为丰氏在当时社会普遍倡导“科学救国”“道德救国”“实业救国”“宗教救国”的大潮下,能够坚持自己的艺术救国之路,“它的重要性受到时代的忽视在所难免,但对今天而言却是预言般的神启”。王伟的《“儒释互补”:丰子恺的艺术审美理论》(载《当代文坛》2012年第2期)认为丰子恺在“儒释互补”的艺术思想基础上吸收转化康德等人的西方美学思想,对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李春尧的《论丰子恺的护生思想》(载《科学·经济·社会》2014年第1期)认为“护生即护心”是丰子恺护生思想的主旨和中心,这一观点体现了佛学与儒学思想的结合,“立足于佛教又不拘泥于佛教,融汇了儒学又超越了儒学,诉诸于童心更深化了童心”。该文还就丰子恺护生思想的现实意义做了进一步说明:其一,它将佛教因果伦理暂搁一边而把护生的意义归之于一心,这对于在现代发扬佛教伦理有积极意义;其二,守护自然就是守护心灵,从而解决了

生态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矛盾与悖论。文章思路清晰,见解精辟,值得赞赏。

在众多的论文中,也有较为“严苛”的批评。郭战涛的《佛教视野下丰子恺的酒肉观与护生观》(载《温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从佛教视野下批判了丰子恺宽松的护生观和不能精严持戒的行为,指出丰氏护生言行有偏差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即在修持方面不能做到精严,并惋惜“若从佛教徒的慈悲精神层面来看,这未尝不是一种缺憾”。事实上,丰氏在“三层楼”的比喻中就已清楚地表达了自己与弘一大师的差距,认为自己始终未真正居住在第三层宗教的高楼上,但却时时勉励自己,向三层上望一望,这就表明了其对于自己人生观的正确定位。丰氏只是在佛教的终极关怀中找到了与自身知识分子追求的相似点,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徒,因此在持戒等事情上并不苛责自己。

以上所举大多是谈丰子恺的艺术思想及其传统渊源,其实他的艺术思想还明显受到西方美学的影响,但深入探讨的论文相对较少。黎萌的《论丰子恺早期的“同情说”——兼与闵斯特伯格的认知主义美学相比较》(载《西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从以下三个层面讨论了丰子恺的“同情说”:其一,丰子恺“同情说”的主要来源并非立普斯(Theodor Lipps),而是同属新康德主义阵营的弗赖堡学派思想家闵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这与受马堡学派影响的朱光潜有很大区别;其二,“同情说”是丰子恺的整体性学说,“绝缘说”“童心说”等都隶属于它;其三,“同情说”在丰子恺各个时期各有侧重,现实环境的转变使“同情说”的外延不断扩大,最终超越了“审美”概念而进入到了“道德”的层面。萧湛的《论丰子恺审美理论之“以仁为本”——兼与宗白华、朱光潜比较》(收入陈星主编的《丰子恺艺术与艺术教育研究》)论述了丰子恺在“主观派”美学(宗白华)与“客观派”美学(朱光潜)之间的徘徊,既体现出两种范式各自的优长,也呈现了两者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该文广泛采引叔本华、舍勒、柏格森、谢林、克罗齐等西方美学家的思想,诠释了丰子恺“以仁为本”的审美理论之多种面向。潘建伟的《论丰子恺的诗画关系观》(载《美育学刊》2016年第5期)从丰子恺对诗画关系的讨论入手,论述中国诗在感情移入、理想表现、言简意繁三个层面对其绘画创作的影响,

并认为丰子恺如此重视诗之于画的意义很可能受到过莱辛《拉奥孔》的影响。

其二是丰子恺的艺术教育(美育)思想的研究。邱春林的《丰子恺早年的“艺术教育思想”与蔡元培美育观之比较》(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探讨了丰子恺艺术教育思想与蔡元培美育观的异同,认为丰氏继承了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而又有所差异:蔡元培把美育作为变革社会的工具,丰氏则更为强调艺术与人生的密切联系,认为艺术教育能“视作苦闷人生的解放之途”。尚丽莉、李树玲的《丰子恺艺术教育思想的特质与启迪》(载《成都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详细阐释了丰子恺艺术教育的宗旨、原则、条件和方法,认为丰氏开拓了美育的新视阈,丰富了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内涵。张昕的《论丰子恺“以人为本”的艺术教育思想》(载《艺术百家》2009年第5期)认为丰氏艺术教育思想不管是宗旨、原则还是方法、途径,都紧紧围绕着人这一主题。蒋霞、杨晓河的《从“入门之道”与“纯正之学”走向审美的人生:丰子恺艺术教育论》(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从“入门之道”“纯正之学”“审美人生”三个维度诠释了丰子恺的艺术教育体系。王梦雅的《“另一种启蒙”——从〈一般〉杂志看丰子恺的美育主张与美育思想》(收入杭州师范大学弘丰中心编的《第三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通过解析丰子恺为《一般》杂志所撰写文章,论述其如何突破“唯科学主义”羁绊,继承和发展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之理念,借助“感性启蒙”而最终建立实现国民信仰之再造的审美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占主导的始终是理性启蒙,感性启蒙一直处于附属位置,该文用“另一种启蒙”来概括丰子恺的美育思想,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启蒙概念的理解。

丰子恺关于分门艺术形式的见解亦颇为独到,对其绘画思想的研究成果可见本文第一部分“美术研究”所述。下面简述对其音乐思想的研究状况。

伍雍宜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一节中有“丰子恺的音乐教育思想”一栏,对丰子恺音乐教育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陈净野的《丰子恺与中国现代的音乐教育》(团结出版社2012年初版)既全面梳理了丰子恺从“五四”以来的音

乐教育实绩,又深入解读了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系,有论者认为“该书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丰子恺音乐教育的实绩,并就其音乐教育思想作了概括,阐明了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一本音乐教育史论方面的力作。”(徐承《〈丰子恺与中国现代的音乐教育〉简评》,载《美育学刊》2013年第5期)刘建东的《丰子恺的音乐功能观》(载《嘉兴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认为可以1937年为界将丰子恺关于音乐功能的思想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为纯粹的音乐审美功能观念占主导,强调音乐的独立自足性,解除音乐与世间一切关系而保持“绝缘”的品质;后期则对此进行了修正,认为音乐应以“仁”为本,强调了音乐对现实与人生的作用,体现了儒家艺术精神。作者另有《论丰子恺的音乐美学思想》(载《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一文,分别从音乐独立自足本质的理解、音乐与情感的表达、音乐的欣赏、音乐的功能以及音乐的审美教育五个层面概括了丰氏音乐美学思想。该文同时指出目前学界对于丰氏音乐思想方面的贡献重视不够,研究不足。

四、生平与作品考证及其他

1998年是丰子恺100周年诞辰,在各地纪念活动陆续开展之际,出现了许多的缅怀、回忆及生平作品考证的文章。周颖南的《丰子恺与周颖南的通信》(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公布了自己与丰子恺从1972年12月3日至1975年5月20日之间共有34封往来书信,信中所谈内容非常广泛,既有两人关于艺术与佛学问题的探讨交流,有在艰难岁月朋友间的相互关怀,还透露了与同时代人物的交游信息。这些书信不但见证了两人之间真挚的友谊,而且提供了不少艺术史、佛学史的资料。文楚的《“日月楼”访丰子恺》(载《世纪》1998年第4期)回忆了自己于1962年拜访居住在“日月楼”的丰子恺,向读者呈现了一个温润尔雅、风趣睿智的艺术家形象。郭若愚的《丰子恺漫画中的儿女们》(载《世纪》1998年第4期)考证了丰子恺29幅漫画的儿女形象及创作时间。韦人庆的《记丰子恺抗日时期在宜山、环江、河池的生活片段》(载《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探访了丰子恺在

宜山、环江、河池三地时的生活场所,走访了还健在的当地知情人,为了解丰氏抗日时期的生活情景与思想状态增添了细致入微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丰一吟为纪念其父所作的努力。丰一吟于1982年就曾与潘文彦等6人合著过《丰子恺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又出版了《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初版),后由团结出版社于2007年重新出版,改名为《我的父亲丰子恺》,这部书被陈星认为是“可信赖的传记”(见所著《丰子恺评传》,第421页)。应中央文史馆和上海市文史馆的《世纪》杂志之邀,丰一吟先将《潇洒风神》的主要内容压缩成《人生短,艺术长——我父亲丰子恺的艺术轨迹》(载《世纪》1998年第4期)一文,简要记述了丰子恺人生与艺术的重要阶段,并配有几张珍贵的老照片。此后,丰一吟另有《我和爸爸丰子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初版),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14年重新出版,改名为《爸爸丰子恺》,据作者自称,该书与《潇洒风神》可看成“姊妹篇”,写作角度完全不一样,可以相互补充。顺便提一下著者另外的两本文集:其一是《天于我,相当厚:丰子恺女儿的自述》(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初版),其二是《梦回缘缘堂:丰子恺》。前书选文55篇,其中谈丰子恺的有46篇;后书收文共54篇,几乎全为谈丰子恺。可贵的是两书所选的文章并无重复。

新世纪以来,生平与作品考证始终是丰子恺研究中一个热门的领域。李连昌的《丰子恺在遵义》(载《文史天地》2002年第6期)考察了丰氏抗战时期在遵义的艺术活动,介绍并高度评价了《子午山纪游册》。方继孝的《抗战初期的丰子恺和他的创作》(载《收藏家》2005年第5期)提供了丰子恺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为编著《册页》专集写给好友钟器先生的信三封和《自传》二纸,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肖丽的《河南大学藏丰子恺漫画的史料价值》(载《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透露了河南大学所收藏丰子恺抗战时期的漫画作品有25幅,并着重介绍《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一间茅屋负青山,老松半间我半间》《今朝风日好,或恐有人来》《吟诗推客去》等六幅画。王炳根的《丰子恺致新加坡的书简》(载《书屋》2010年第3期)统计了丰子恺从1935年至1973年给广洽法师的

120多封书简,并按年代顺序,将信的主要内容分为“交往与缘分”“三年困难时期的救助”“弘一大师遗墨的出版”与“《护生画集》的创作与出版”四个部分。李建平的《抗战时期丰子恺、廖冰兄、叶浅予等漫画家在桂林的艺术活动》(载《艺术探索》2014年第5期)介绍了抗战时期丰子恺等数位漫画家在桂林的艺术创作与抗日宣传,认为这是“桂林抗战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庆江、董婧宸的《新见丰子恺致宋云彬信札考释》(载《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3期)介绍了丰子恺于1956年到1962年前后致宋云彬的8封书信,内容涉及两人的交游、商议纪念弘一法师以及关注钱稻孙境遇等事宜。陶小萍的《馆藏丰子恺档案简介》(载《浙江档案》2016年第6期)介绍了桐乡市档案馆所藏有关丰子恺的四类材料:一是翻译及创作的手稿,二是体现个人重要经历的一些证书,三是反映日常生活的单据、信函,四是原来家中的一些书架等实物。许懋汉的《丰子恺〈护生画集〉手稿失而复得》(载《档案春秋》2016年第7期)介绍了朱南田将辛苦保存的《护生画集》第二集献给丰子恺以成全璧的义举。另外,作为丰子恺长外孙的宋菲君的《“课儿”——外公丰子恺的家庭教育》(收入杭州师范大学弘丰中心编的《第三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以亲身经历详细描述了丰子恺生动的家庭教育之内容与特色,回忆了他关心儿孙们的成长、留意他们的兴趣以及注重因材施教的方法。

叶瑜荪在丰子恺生平考证上做了大量工作,他的《丰子恺与开明书店》(载《出版史料》2008年第4期)梳理了丰氏与开明书店的密切关系。他的《丰子恺书简(一)(二)(三)(四)》(载《出版史料》2012年第1至4期)选辑并注释了丰子恺致汪馥泉、赵景深等师友的书简。作者另有《丰子恺致汪馥泉书信年代考》(收入杭州师范大学弘丰中心编的《第三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一文,考证丰子恺致汪馥泉书简的确切年代。刘晨近年对丰子恺的艺术类文献多有关注,她的《民国期刊中的丰子恺艺术类文献寻佚》(载《美育学刊》2013年第2期)评述了丰子恺的《图画教授法》《由艺术到生活》《都会艺术》《近世音乐大家》《图书教育的效果》《艺术教育之本意》六种艺术类散佚文献,同时列举了《春晖》《民国日报·艺术评论》《教育杂志》《小

说月报》等期刊中的文献目录。作者另在《丰子恺艺术类著作的版本流变考述》(载《美育学刊》2014年第6期)一文中梳理了丰子恺的《音乐入门》《西洋美术史》《艺术教育》等艺术理论、艺术杂著类图书的版本信息。

丰子恺生平史料方面的研究还有如下一些论著需要提及。陈星的《清空朗月——李叔同与丰子恺交往实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初版)以史家的笔调记录了李叔同与丰子恺的交往过程,该书除引言与附录外,共分三篇:上篇包括“幸会”“薪传”与“送别”,中篇包括“重逢”“缘分”与“护生”,下篇包括“遥念”“永怀”与“圆满”。作者的另一部《新月如水——丰子恺师友交往实录》(中华书局2006年初版)分为“师生情怀”“同门与同人”“交友与艺友”与“异国艺缘”四个部分,寻绎了丰子恺与师友之间的交往过程,为研究者进一步探讨丰子恺与同时代人的关系提供了基础与线索。陈星另有《丰子恺研究学术笔记》(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初版)与《丰子恺研究史料拾遗补论》(团结出版社2009年初版)二书,其中包含着大量丰子恺生平与作品研究的史料信息。陈净野的《丰子恺杭州行迹考论》(杭州出版社2008年初版)按丰子恺生平的各个时期为序,详细寻绎了他在杭州的求学、生活与创作的方方面面,称得上绘制出了一幅“丰子恺杭州行迹图”。张振刚的《丰子恺、章桂和“逃难”这两个汉字》(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初版,后改书名为《和丰子恺逃难的日子:小人物章桂的时代记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重新出版)通过与曾为丰同裕染坊学徒的章桂断断续续的4次共计10天的弥日长谈,叙写了在大时代背景下一个小人物与艺术家丰子恺的共同经历。

传记与年谱是思辨研究开展之前提,又是生平考证工作之总结。近20年来关于丰子恺的传记大量出现,主要有钟桂松的《丰子恺的青少年时代》(花城出版社1998年初版)、黄江平的《文苑丹青一代师——丰子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初版)、徐国源的《丰子恺传》(团结出版社1999年初版)、郑彭年的《漫画大师丰子恺》(新华出版社2001年初版)、刘英的《丰子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初版,之后又在此书上配上了一些图像而成《丰子恺图传》一书,由同一出版社2005年出版)、盛兴军与盛希合著的

《丰子恺画传》(青岛出版社2010年初版)及梁晴的《丰子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初版)等。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以下三部传记。陈星曾出版过《人间情味——丰子恺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初版),采用小说的形式,虚构了很多情节对话,是一部文学传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故而作者重起炉灶,另写了一部《丰子恺新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初版),在“内容丰富”与“形式活泼”的基础上确保传记的“纪实”特征。吴浩然的《缘缘人生——丰子恺画传》(齐鲁书社2008年初版)中的绘画与文字,都是作者本人所作。绘画清新,文字简练,图文并茂,别具一格。陈野的《缘缘堂主——丰子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初版),收入由万斌主编的“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陈星在《近三十余年丰子恺研究与纪念活动综述》中予以较高的评价。

关于丰子恺年谱主要有三部:其一为盛兴军的《丰子恺年谱》(青岛出版社2005年初版),其二为陈星的《丰子恺年谱》(西泠印社2001年初版),其三为陈星的《丰子恺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初版,2017年1月修订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丰子恺年谱长编》,该书在全面研究丰子恺的思想、艺术以及其所在社会背景、文化艺术思潮基础上,通过浩瀚的文献甄别、考证,最大限度地反映了丰子恺的生平事迹,是著者30多年来研究丰子恺的一个总结。杭之认为该著在史料的占有与考订、史料的剪裁以及体例的编制上都有重要贡献(杭之《评〈丰子恺年谱长编〉》,载《美育学刊》2015年第4期)。吴明则说该书称得上是一部“丰子恺文化志”,“是对丰子恺的一种立体式、全方位的文化深描”(吴明《“丰子恺文化志”:立体式工笔深描——评陈星〈丰子恺年谱长编〉》,载《中国艺术报》2015年7月22日第008版)。

生平与作品考证的研究已如上述,下面附带介绍一下关于丰子恺翻译作品的研究。

丰子恺的翻译作品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品质精上。王向远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初版)比较了丰子恺与林文月各自翻译的《源氏物语》后认为“两种的译文风格各具千秋:丰译本多用《红楼梦》那样的古代白话小说的词汇句法,典雅简

介,华美流利;林译本则使用标准的现代汉语,将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与日常口语很好地结合起来,通俗而不流俗,清新而又亲切。”(第396页)余连祥的《鲁迅·丰子恺·〈苦闷的象征〉》(载《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4期)比较了鲁迅与丰子恺各自翻译《苦闷的象征》的特点,并认为由于两人的翻译,厨川白村的这部作品逐渐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形成了一个“苦闷的话语空间”,影响深远。中国留学生徐迎春赴日本九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于2010年完成学位论文《平安朝物語の中国語訳に関する研究—先驅者としての豊子愷の訳業について—》,2015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书名为《丰子恺译日本古典文学翻译研究》,正文文字仍为日语。该书探讨了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伊势物语》《竹取物语》以及《落窪物语》四部日本古典文学作品,评述了丰氏的翻译特点。徐迎春另有汉语论文《丰子恺译〈伊势物语〉的版本考证》(载《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年第4期)探究了丰子恺译的《伊势物语》与最为常见的日本天福本《伊势物语》原文在内容与结构上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指出丰子恺所用的版本是中河与一的现代日语译本。姚继中于2014年做了日本山口大学东亚研究科“客员教员”研究报告《『源氏物語』に関する訳訳検証研究の必要性—豊子愷、林文月、姚継中の訳訳した『源氏物語』和歌を例として—(〈源氏物語〉翻译验证研究的必要性:以丰子恺、林文月、姚继中翻译〈源氏物语〉和歌为例)》^②。该文经作者整理后以题为《论〈源氏物语〉翻译验证研究——以紫式部原创和歌翻译为例》的汉语论文载于《外国语文》2015年第1期。诚如姚继中所言,由于种种现实因素,研究者们“难以潜心进行双语对比论证,往往以浅尝辄止的肤浅评论审视翻译作品”,故而总体上说,对于丰子恺翻译作品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五、港台及国外的研究

香港地区的丰子恺研究说不上很丰富,但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发展。洪长泰(Chang-Tai Hung)早在1990年就发表过“War and Peace in

^②本文在介绍日语文献时,统一在书名号内用括号加注中译名。

Feng Zikai's Wartime Cartoons”(《丰子恺战时漫画中的战争与和平》)载于 *Modern China* 《现代中国》1990年1月第16卷第1期。之后又写了关于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的专著 *An Artistic Exile: A Life of Feng Zikai*(1898—1975)的英文书评,刊于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中国文学:随笔、论文与书评》2004年12月这一期。在文章中,作者对该书作出了高度评价:“作者精要地为读者们提供了社会与政治的多面性语境,他们从中能看到丰子恺艺术的发展、繁荣,到被迫转型,然后变得黯淡,最后得到重生的全过程。”同时作者也指出该书两个缺点:其一是以年代与主题的双重叙事线索使得某些内容过于重复,其二是详于总结丰子恺漫画与散文的成就而疏于叙述他的翻译贡献。香港教育学院文学及文化学系霍玉英的《丰子恺儿童漫画与儿童图画书》(载《中国儿童文化》2013年第8辑)重点探讨了丰子恺的连环儿童漫画,认为丰氏用图文互补的方式不但凝练地表现了鲜活的儿童情趣,而且具有层层递进故事情节,虽然丰氏没有正式创作过“儿童图画书”(Children's Picture Book),但却“深具现代儿童图画书的精神”。香港地区的单篇论文还有孙立川《生死以之 义无反顾——〈护生画集〉的成书及其宿命论》(载《香港文学》2001年6月号总第198期)、卢钢锴的《丰子恺的漫画》(载《公教报》2001年2月25日总第2975号)及祁文杰的《丰子恺情味》(载《读书好》2009年7月第22期)等。

关于台湾地区的研究状况,黄仪冠的《丰子恺与台湾之因缘》一文有过介绍,这里只略作补充。赖振南的日语论文《『竹取物語』における「物語歌」中国語翻訳問題試論(试论〈竹取物语〉中的“物语和歌”翻译问题)》(载《台大日本语研究》2003年第4期)认为丰子恺将日语和歌一律译成五七言句,在精炼了文意之同时,也简化了文意,无法较完整地呈现原文的意境。林素幸(Su-hsing Lin)于2003年完成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Feng Zikai's Art and The Kaiming Book Company: Art For the People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由陈军翻译为《丰子恺与开明书店——中国20世纪初的大众艺术》(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初版)。该书旨在探讨“丰子恺的艺术职业生涯与20世纪早期中国艺术发

展”、“20世纪艺术家与出版社之间的关系,以及艺术家们如何向大众和后代传播自己的理念或美学思想的问题”。由于作者的海外求学背景,该书一大优点是介绍了大量的国外相关文献,充实了丰子恺研究的资料。吴元嘉的《丰子恺童话对古典文学的继承》(收入杭州师范大学弘丰中心编的《第三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从精神内涵、叙述模式、题材借鉴及典故运用四个层面,深入分析了丰子恺童话对古典文学的继承。台湾地区的单篇论文还有张俐雯的《“缘缘堂”的符号象征意义》(载《止善》2006年第1期)、《弘一法师影响丰子恺析论——以艺术启蒙、人格感化与作品思想为中心》(载《止善》2009年第7期)及《丰子恺与书法》(载《慈济通识教育学刊》2013年第8期)林素辛的《丰子恺的山水风景画与日本浮世风景画》(载《美术学报》2006年第1期)李岗的《丰子恺童心观的概念分析及其于教育上之应用》(载《当代教育研究季刊》2011年第19卷第3期)与《丰子恺的美育思想》(载《课程与教学》第14卷第1期)张卉的《丰子恺与中国近现代艺术精神的缔造》(载《书画艺术学刊》2012年第13期)孙中峰的《植基于艺术教育实践的文艺观:丰子恺文艺思想(1919—1949)一个面向的探究》(载《高应科大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10卷第2期)以及蒋劲松的《丰子恺护生思想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变》(载《法印学报》2014年第4期)等。

国外的研究较为零散,笔者的搜集也不够全面,但以下这些成果是必须提到的。挪威学者克里斯托弗·哈布斯迈尔(Christoph Harbsmeier,中文名又为何莫邪)于1984年出版专著 *The Cartoonist Feng Zikai: Social Realism with a Buddhist Face* (Oslo, Bergen, Stavanger, Tromsø: Universitetsforlaget, 1984)。该书陆续产生两个中译本:其一为陈军译的《漫画家丰子恺——具有佛教色彩的社会现实主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1年初版),其二为张斌译的《丰子恺——一个有菩萨心肠的现实主义者》(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初版)。白杰明在1989年就写过论文“An Artist and his Epithet: Notes on Feng Zikai and the Manhua”,考证了中文“漫画”一词的渊源以及其在中国近现代的演变,该文后由陈军译为《“漫画”之蜕变》,收入朱晓江主编的《丰子恺论》。白杰明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撰成专著

An Artistic Exile: A Life of Feng Zikai (1898 - 1975), 于2002年由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由贺宏亮翻译的中译本,书名为《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1898—1975)》。美国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也为《艺术的逃难》写过书评,载于*The China Journal*(《中国期刊》)2004年1月总第51期。他认为该书摆脱了各类主流传记的叙事模式,是“对艺术史的一个挑战,提供了一种可能解决这类历史的成功方式”。但作者同时也指出该书的一个瑕疵是太过专注于“丰子恺绘画显示出来的脱离尘世的形象”,而忽略了丰子恺在当时其实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书籍的销量与艺术的价值并不一定成反比。

笔者要着重介绍的是日本的丰子恺研究。日本的丰子恺研究起步很早,成绩突出。当整个丰子恺研究领域连硕士论文都难得一见时,杨晓文就于1996年完成神户大学博士论文《豐子愷論(丰子恺论)》,后于1998年由东京东方书店出版,书名为《豐子愷研究(丰子恺研究)》。杨晓文另有汉语论文《丰子恺与曹聚仁之争考辨》(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集中于丰子恺研究中悬而未决的丰氏与曹聚仁之争的问题,认为曹氏的《一饭之?》实际上应为《一饭之仇》,同时指出丰曹之争的根源除性情相异外,更多的是时代观和文艺观的不同。

西槇伟(西槇偉)是最近20年在日本丰子恺研究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必须提及他的两本专著。其一是《中国文人画家の近代——豐子愷の西洋美術受容と日本(中国文人画家の近代——丰子恺的西洋美术接受与日本)》(京都:思文阁出版2005年初版)。该书汇集了作者自1994年以来到2005年前探讨丰子恺与日本作家、艺术家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除前言与序章及终章外,正文共为九章,依次讨论了西洋美术接受高潮时期的丰子恺、丰子恺与米勒、丰子恺与黑田重太郎、丰子恺通过梵高再发现传统、丰子恺与竹久梦二、丰子恺与北泽乐天、丰子恺所见之西洋近代画家、丰子恺的中国美术优位论以及中国文人的近代化等诸问题,在东亚视野中系统阐释了丰子恺的艺术思想与日本及西洋艺术之间的关系。该书第三章“ゴツホは文人画家か——豐子愷と黒田重太郎”(梵高是文人画家么——丰子恺与黑田重太郎)的主要内容作者

译成《丰子恺与凡高》一文,已收入朱晓江主编的《丰子恺论》。该文通过梳理丰子恺的《谷河生活》与黑田重太郎的《谷河传》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丰子恺的凡·高形象之形成过程及原因。该书第六章“豐子愷と北澤楽天”的主要内容也由作者译成《丰子恺与北泽乐天》,收入《论丰子恺:2005年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文中主要探讨了丰子恺的漫画在“广罗各种社会的现状,描摹各种问题的纠葛”等题材上受到北泽乐天的影响。作者的第二本书是《響きあうテキスト: 丰子愷と漱石、ハーン(交互影响的文本: 丰子恺与夏目漱石、小泉八云)》(东京:研文出版2011年初版)。该书汇集了作者自2005年到2011年前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丰子恺与夏目漱石、小泉八云之间关系的成果,分为三大部分,共十一章。其中第一部分依次探讨了丰子恺初期作品中的《法味》与夏目漱石的《初秋の一日(初秋的一日)》《門(门)》,丰子恺的《忆儿时》与夏目漱石的《硝子戸の中(玻璃门内)》,丰子恺的《华瞻的日记》与夏目漱石的《柿》,丰子恺的《縁》与夏目漱石的《ケーベル先生(凯贝尔先生)》等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依次探讨了丰子恺成熟期作品中的《林先生》与夏目漱石的《ケーベル先生》,丰子恺的《縁縁堂随笔》与夏目漱石的《硝子戸の中》等之间的关系,并顺势比较了丰子恺的《林先生》与鲁迅的《藤野先生》之间的写作异同。第三部分依次讨论了丰子恺的《蝌蚪》与小泉八云的《文鳥(文鸟)》《草ひばり(草云雀)》,丰子恺的《蜜蜂》与小泉八云的《蠅の話(蝇话)》,丰子恺的《清晨》与小泉八云的《蟻(蚁)》等之间关系。该书从个案的角度深研了丰子恺散文的日本渊源,并总结了这一文学的交互现象在中日近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意义。其中第四章“异文化の対話——《縁》与《ケーベル先生》”已先由作者自译成《异文化的对话——丰子恺(縁)与夏目漱石(凯贝尔先生)》一文,收入杭州师范大学弘丰中心编的《如月清凉——第三届弘一大师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初版)。第十一章“アリへの賛歌——《清晨(早朝)》与《蟻》”又由作者自译为《献给蚂蚁的赞歌——丰子恺的小品〈清晨〉与小泉八云〈蚂蚁〉》收入杭州师范大学弘丰中心编的《第三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日本另外一位颇有创获的研究者是大野公

贺。她早在2002年就以丰子恺为主题完成东京大学硕士论文,之后又继续深入,于2009年完成东京大学博士论文《中华民国期の豊子愷:新たな市民倫理としての「生活の芸術」論(中华民国时期的丰子恺:作为新市民伦理的“生活的艺术”论)》。同时作者又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主要有《民国期における「子愷漫画」の流行——新興都市大衆と豊子愷——(民国时期“子愷漫画”的流行:新兴都市大众与丰子恺)》(载《东京大学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纪要》2005年4月第8号)、《豊子愷における自己確立のための模索——浙江省立第一師範から東京留学まで——(丰子恺自我确立的探索期: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到东京留学)》(载《东京大学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纪要》2009年12月第12号)、《豊子愷の仏教信仰における弘一法師と馬一浮『護生画集』を中心に(丰子恺佛教信仰中的弘一法师与马一浮:以〈护生画集〉为中心)》(载《东京大学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纪要》2010年11月第13号)、《『護生画集』解題(1)——豊子愷の仏教皈依から第一集まで(〈护生画集〉解題之一——从丰子恺皈依佛教到第一集的完成)》(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012年12月第162册)、《豊子愷の描いた桃源譚——『赤心国』(丰子恺笔下的桃花源——〈赤心国〉)》(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015年3月第167册)、《豊子愷『護生画集』解題(2)——心の自由を求めて(丰子恺〈护生画集〉解題之二——追求心灵的自由)》(载《东洋法学》2014年1月第57卷第2号)、《豊子愷『教師日記』研究(一)(丰子恺〈教师日记〉研究之一)》(载《东洋法学》2015年7月第59卷第1号)、《豊子愷による落語の翻案童話『化かされた博士』について(〈博士见鬼〉:由丰子恺从落语改编的童话)》(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016年3月第169册)。作者于2005年受邀参加首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论文《追求精神的自由——从〈教师日记〉读丰子恺》。该文呈现了丰子恺与曹聚仁等关于战争与艺术之间的论争,并以丰子恺《教师日记》及当时的漫画创作为文献基础,解读了战争时期丰子恺的艺术思想与宗教观念,最后认为“也许正是丰子恺——在抗战的颠沛之中守护心境,追求艺术境界与精神自由,从而确立了独特的护心思想的丰子恺——才能

冷静而泰然地度过波涛汹涌的‘文革’时期。”(见《论丰子恺——2005年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289页)关于《教师日记》的研究以及丰子恺护心思想的研究,作者之后又有进一步的研究,相关文献已如上述。

日本的丰子恺研究者还有如下几位需要提及。稻贺繁美(稻賀繁美)发表法文论文“Théodore Duret, Kuroda Jûtarô et Fengzikai: Biographie de Van Gogh et sa repercussion en Asie de L'Est”(《西奥多·杜雷特,黑田重太郎:梵高传及其在东亚的影响》),刊于*Japan Review*(《日本评论》)1998年第10期。该文通过比较三种传记,追溯了梵高的形象在东亚文化中的转变,认为在黑田重太郎那里,梵高的“疯狂”被重释为艺术家创造力的积极体现;而在丰子恺那里,梵高的超尘逸俗的形象被夸大为中国“隐士型艺术家”(hermit-like artist)相似。作者总结道,东洋化倾向事实上是在宣告亚洲美学优于欧洲美学,而这正与丰子恺30年代努力的整体方向一致。佐藤由佳于2006年完成杭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丰子恺与落谷虹儿——兼及日本抒情画在中国的影响》。作者另有《解读〈六千元〉》(收入《论丰子恺:2005年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最早全面解读了丰子恺的小说《六千元》。木村泰枝近年的丰子恺研究成果也较为突出,连续发表了《豊子愷の竹久夢二受容の起点:「故郷」と「都会」へのまなざしの違いについて(丰子恺接受竹久梦二的起点:关于两者眼中“故乡”与“都会”的差异)》(载《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2015年3月第36号)、《竹久夢二と豊子愷研究ノート(二)——ホイッスラー・竹久夢二・豊子愷を繋ぐ“橋の絵”——(竹久梦二与丰子恺:研究笔记之二——连系惠斯勒、竹久梦二与丰子恺的“桥的画”)》(载《中国文史论丛》2015年3月第11号)、《竹久夢二と豊子愷研究ノート(三)——豊子愷の目に映った李叔同像——(竹久梦二与丰子恺:研究笔记之三——丰子恺心目中的李叔同像)》(载《中国文史论丛》2016年3月第12号)。^③作者另有《丰

^③按:据作者自述,《豊子愷の竹久夢二受容の起点「故郷」と「都会」へのまなざしの違いについて(丰子恺接受竹久梦二的起点:关于两者眼中“故乡”与“都会”的差异)》一文即作为《竹久夢二と豊子愷研究ノート(一)(丰子恺与竹久梦二:研究笔记之一)》对待。

子恺“故乡”观念初探》(收入杭州师范大学弘丰中心编的《第三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该文参考矶田光一氏提出的“故乡”概念,分析了丰子恺的“故乡”的空间性,以及与“故乡”相连的“记忆”。另外,大桥茂、大桥志华合写的《丰子恺与〈源氏物语〉》(收入陈星主编的《丰子恺艺术与艺术教育研究》)认为丰子恺译《源氏物语》所根据的日文原文是谷崎润一郎的现代日语本,同时参考了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英译本。两位作者另有“Sweet Home”(收入杭州师范大学弘丰中心编的《第三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介绍了丰子恺的人生与西洋歌曲 *Home, Sweet Home* 的密切关系。

日本的相关论文还有吉川健一(中文名陆伟荣)的《豊子愷作品におけるルーツ:「雅」と「俗」の間に成立した芸術(丰子恺作品之根:成立于“雅”与“俗”之间的艺术)》(载《中国近现代文化研究》2015年3月第16期)与《豊子愷の芸術——竹久夢二の影響をうけた中国近代漫画の鼻祖(中国近代漫画鼻祖竹久梦二对丰子恺艺术的影响)》(载《勉诚出版》2000年5月第16期)、吴卫峰的《豊子愷訳『源氏物語』の出版の遅れについて(关于丰子恺译〈源氏物语〉的延迟出版)》(载《东北公益文科大学综合研究论集》2011年第1辑)、流通科学大学的陈洪杰与神户大学的李爱华合写的《随筆『兒女』に見ら

れる朱自清と豊子愷の兒女観(从随筆〈儿女〉看丰子恺与朱自清的儿女观)》(载《流通科学大学论集——人间·社会·自然编》2010年第22卷第2号)以及田中干子(田中幹子)与郑寅龙(鄭寅瓏)合写的《豊子愷訳『源氏物語』の問題点について:「桐壺巻」における林文月訳、銭稻孫訳との比較(丰子恺译〈源氏物语〉之问题点:与林文月、钱稻孙译的“桐壶卷”之比较)》(载《东亚比较文化研究》2012年6月第11期)等等。

近20年来的丰子恺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伴随着明显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阐释错位”与“阐释不足”两个方面。“阐释错位”也即以某种“主义”“理论”随意剪切丰子恺的具体作品,往往使艺术文本成为理论牵强附会的例子。“阐释不足”也即在文献资料尚未充分占有的情况下即行分析、归纳、概括,所得的结论往往与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产生较大的差距。另外,低水平重复也是丰子恺研究领域非常突出的问题。故而研究者们除了要有理论的武装,需要尽可能掌握全面的文献资料,还需要对研究史有一定的把握,因为任何一种研究都不是横空出世,而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而来。限于笔者的视野与水平,本文的评述内容或有不当,论著搜集或有遗漏,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丰子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完全是可以预期的。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in Feng Zikai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1997 – 2016)

SONG Rui, PAN Jian-w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Art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From 1997 to 2016, research in Feng Zikai has yielded richer results, both in depth and breadth, than any other previous period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ummarize it. This paper proposes to review this remarkable period from five aspects, namely, "art research", "literary research", "research in artistic thought", "research in life and works" and "research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abroad", showing the achievements and breakthroughs in the research produced in these two decades, identify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therein and facilitating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research in Feng Zikai; review; period of gradual maturing

(责任编辑:刘晨)